一、1949–1980 ——
沈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沈從文(1902－1988)，1949年自殺不遂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發展出三個方面的新思想：新愛國主義、新人民觀及新唯物論。圖為與妻子張兆和合攝。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1949 年初，當經過 1948 年的大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以至疑懼，準備面對新中國的誕生的時候，文壇上爆出一個自殺事件：3 月 28 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家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後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提出了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由此而引發了人們對沈從文在 1949 年以後的命運的關注：他一身兼具「鄉下人」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雙重立場與身份，自然是別有一種典型意義的。本文將就此討論五個問題。

一、沈從文為何自殺？

文人自殺是易代之際的典型現象。1948 年 11 月出版的沈從文的朋友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曾發表文章，討論當年王國維的自殺，以及 1948 年詞人、鐫刻家喬大壯[1]的自殺，指出：「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兩個時代，兩種文化在那裏競爭。舊的必滅亡，新的必成長。孕育於舊文化裏的人，流連過去，懷疑未來，或對於新者固無所愛，而對於舊者已有所懷疑、憎恨，無法解決這種矛盾，這種死結，隱逸之途已絕，在今日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可奈何，只好毀滅自己，則死結不解而脫。像王靜安、喬大壯兩位先生都是生活嚴肅認真、行止甚謹的人，在這年頭兒，偏偏就是生活嚴肅認真的人，難以活下去。所以我們對於王、喬兩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復悲其遇，所謂生不逢辰之謂也」。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沈從文從他的「常」與「變」的歷史觀出發，早在1948年即已認定：「一切終得變。中國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在這個意義上，「變」即「常（態）」（「道」）。「凡事將近於自然。這裏若有個人的滅亡，也十分自然」[2]。

「舊的社會實在已不濟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這就意味着要「一切價值重估」。問題是這樣的「易代」，由「舊時代」將轉入怎樣的「新時代」，將發生怎樣的價值變化？沈從文也有一個明確的判斷：「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後卻必須用『信』字起步」[3]。十三年後的1961年，沈從文又這樣談到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這個人類歷史變動最大的時代，而恰恰生在這個點上，是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4]。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沈從文的判斷，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說「毛澤東時代」確實是一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像沈從文這樣的知識分子能適應這個由「思」向「信」的歷史大變動嗎？

沈從文發現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一） 作為一個「文法部門」的知識分子（即今天所謂人文知識分子），能夠放棄「思想」嗎？「我思，我在」[5]，「思」對沈從文具有存在論的意義，豈能輕言放棄？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連續性，頑固排他性」的，是無法「忘我，無我」的，「我持」愈強愈難做到[6]。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二） 作為一個「內向型」的知識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遠有『不承認現實』的因數」，有「永遠不承認強權的結子」，「總覺得現實並不合理」。這樣的懷疑主義的，永遠不滿足現狀的知識分子，能夠和需要用「單純信仰」來維持既定統治秩序的「時代要求」相適應嗎？[7]——人們很容易聯想起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裏對「不滿意於現狀」的「感覺靈敏」的「文藝家」的命運的思考。其實，幾乎和沈從文同時，後來成為「胡風分子」的張中曉也在思考這個問題[8]。

（三） 作為一個固執的「鄉下人」，「鄉村簡單生活和自然景物」，以及反映這樣的生活理想的「舊小說」，是自己多年來抗拒現實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墮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處，這樣的「生命經驗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夠輕易割斷的嗎[9]？這背後似乎還隱含着對「鄉土中國」的消亡的疑懼。

這已經涉及到新時代如何看待自己，自己視為生命，極為看重的文學上的成績的問題。本來，沈從文對於在「一切價值重估」的時代，自己「許多努力得來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無意義可言」是有思想準備的[10]，但卻沒有想到，他所面臨的卻是「大批判」的革命風暴：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而郭沫若的批判其實是大有來頭的。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透露，1948 年 1 月 14 日毛澤東曾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分局電，內稱：「要在報刊上對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於美帝及國民黨反動派存有幻想、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反對共產黨的某些中產階級右翼分子的公開的嚴重的反動傾向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11]。這對沈從文的打擊是致命的，如在給朋友的信中所說，「迫害感與失敗感，愧與懼，糾紛成一團，思索復思索，便自以為必成一悲劇結論」[12]。沈從文在給丁玲的信中則說是「恐怖迫害」，「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作成個人傾覆毀滅」[13]。總之，「我行將被拒絕於群外，陽光不再屬於我有了」[14]，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曹禺筆下的陳白露的「太陽出來了，太陽不是我們的」的著名台詞。這樣的「革命勝利了，知識分子卻毀滅了」的恐懼是從海涅開始的世界知識分子歷史所共有的命題[15]。

這樣，沈從文的困惑以至恐懼實際上已經上升為存在論的層面：「繩子斷碎了，任何結子都無從……」，「你是誰？你存在——是肉體還是生命？」[16]，「我思，我存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一切依舊存在」[17]，「革命來臨以後」，我將「如何自處？」[18]，「我（的）『意志』是什麼？」「『我』在什麼地方？尋覓，也無處可以找到」[19]，「我實在不明白我應擱在什麼位置上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這個選擇力」，「我究竟是在什麼位置上？」[20]。

其實，早在40年代沈從文就有了「陷溺」在由「統治者」，「被它所囚縛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共同構成的「無邊無際的海洋」（這很有點類似魯迅所說的有形之陣與「無物之陣」）裏，「把方向完全迷失」的恐懼[21]。他說「由於外來現象的困縛，與一己信心的固持，我無一時不在戰爭中，無一時不在抽象與實際的戰爭中，推挽撐拒」[22]，以至「心智神經失去靈明與彈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數人說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的死」[23]。因此，確如論者所說，沈從文的「瘋狂」與自殺都是有「自身思想發展的內在緣由」的[24]。如果說 1940 年前後，沈從文的瘋狂與自殺傾向，是由理想（即他所說的存在於「抽象」裏的「生命一種最完整的形式」）和現實人事之間的巨大衝突所引發[25]，他尚能夠在其間「推挽撐拒」；而到了 1949 年，沈從文卻面臨着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只要被體制拒絕了，就要陷入「凡是大門都關得嚴嚴的，沒有一處可以進去。全個社會都若對於陌生客人表示拒絕」的根本性的存在困境，他連掙扎的可能都沒有了[26]。

於是，沈從文就深深地陷入了兩大精神、心理病態的折磨之中，無以自拔，也無法自救。

首先是被時代、歷史、社會徹底拋棄的「游離感」：「生命不過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離」[27]。沈從文想起自己一生都是「完全游離於生活之外，作一個旁觀者」，這難道就是一種宿命？[28] 他覺得自己像「失去方向的風箏」漂浮在天空，「不辨來處歸處」；在剎那間，他甚至產生自己的生命（肉體的與精神的）「游離四散」而「破碎」的幻覺[29]。在幻覺消失以後，他又如此冷靜分析這樣的游離狀態給自己造成的生存困境：「如果工作和時代游離，並且於文字間還多抵牾，我這種『至死不殆』強執處，自然即容易成為『頑固』，為作繭自縛困難。即有些長處，也不免游離於人群的進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涼」[30]：意識到這一點，他感到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更讓他感到恐怖的是，自己「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絕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應當那麼休息了！」[31] 這樣的孤立感對沈從文是致命的。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幻覺：

> **向每一個熟人鞠躬，說明不是一道。**
> **向你們微笑，因為相互十分生疏，**
> **而奇怪會在一起如此下去。**
> **向你們招呼，因為可以增加生疏。**
> **一切都不可解，卻始終得這樣繼續下去。**[32]

這樣的在「熟人」（知識分子群）中的生疏感、異己感，其實是早已存在於沈從文心靈深處的：他無法擺脫自己的「鄉下人」的身份與情結。他在這一時期寫給張兆和的信中就提醒說：「莫再提不把我們當朋友的人，我們應當明白城市中人的規矩，這有規矩的，由於不懂，才如此的。」[33] 而那些把自己當作朋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沈從文的心中也是自有一條線的：他後來就談到自己和胡適不討論政治，因為「他們談英美政治，和我的空想社會相隔實遠」，也不和梁實秋談文學，「因為那全是從美國學校拿回來的講義，和我的寫作實踐完全不合」[34]。而現在，在這歷史轉折關頭，沈從文更是感到了和這些朋友的隔膜。梁思成、林徽因曾在給張兆和的信中這樣描述他們這些留在大陸，聚集在清華園裏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生活與心境：「生活極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樣的打發日子，……而且人人都是樂觀的，懷着希望的照樣工作」[35]。沈從文對老朋友的樂觀作出了強烈的反應：「若勉強附和，奴顏苟安，這麼樂觀有什麼用？讓人樂觀去，我也不悲觀」[36]。在沈從文看來，這樣的「附和」潮流而求「苟安」是以放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奴顏」）為代價的，不過是他早已看慣的「城裏人」的「世故」[37]，是自己這樣的固執的鄉下人無論如何也學不來的，自己只有孤身堅守了。但卻因為堅守而被朋友「當了瘋子」，這是沈從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文最感驚心的：「沒有一個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並不瘋」，「我看許多人都在參預謀害，有熱鬧看」[38]。這樣的親密朋友成了「看客」，都「參預謀害」的幻覺，是足以使沈從文崩潰的。——這很容易讓人們聯想起魯迅筆下的「狂人」。

沈從文在給丁玲的信中又這樣寫道：「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遠陷入迫害瘋狂回復裏，只覺得家庭破滅，生存了無意義」[39]。這樣的「家庭破滅」就幾乎把沈從文的恐懼與瘋狂推到了頂端。關於家庭危機，沈從文有兩點暗示，很值得注意。一是談到自己這個「只知空想胡寫，生活也不嚴肅的人」，「目下既然還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幫助我站得住，不至忽然圮坍的，即工作歸來還能看到三姐」[40]。這裏談到「生活不嚴肅」，所暗示的自然是沈從文的家庭感情危機。過去已有學者考證、研究過沈從文和詩人高青子、九妹的婚外戀[41]，2009 年《十月》2 期發表了新發現的沈從文 40 年代小說《摘星錄》和《夢與現實》的初刊稿，所寫的正是沈從文的另一段婚外戀情，《摘星錄》即是這樣的愛欲經驗和幻想的產物，也就是這篇小說被許傑等作家批評為「色情作品」，郭沫若直斥沈從文作品為「粉紅色的反動文藝」，其主要依據大概也是這篇作品。而在 1940 年前後，沈從文的這些婚外戀是引發了家庭危機的，在這一時期的作品裏，沈從文頻頻談到精神的瘋狂與自殺欲念，其中一個重要觸因就是「主婦」的態度「陷我到完全孤立無助情境中」[42]。在感情與家庭危機過去以後，沈從文在 1945 年為紀念結婚十三年寫了一篇題為《主婦》的小說，坦承自己「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鄉下人不見世面處，極容易為一切造形中完美藝術品而感動傾心」，並無法擺脫「長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這都造成了「情感泛濫」而給家庭帶來「危險」，他說自己為此「戰爭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了十年」，並表示「我得從公民意識上，凡事和主婦合作，來應付那個真正戰爭所加給一家人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的最後，「我」又被「平衡」理性與情感矛盾的「幻念」帶到了「瘋狂」，在「無邊際的思索」所產生的幻覺中走向滇池，在往前一步即陷入死亡的深淵的那一瞬間清醒了：「我得回家了」，「我」又回到「主婦」身邊，但還是「遙聞一種呼喚招邀聲」[43]。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無邊際思索—瘋狂幻覺—自殺欲念—回家欲念」的心理模式，在我們所討論的「1949年沈從文自殺事件」中再一次出現了，或者說被延續，發展了。這一次並沒有「感情泛濫」造成的家庭危機，但郭沫若「反動黃色文藝」的指責，則顯然會引發本已趨於平靜的感情的痛苦記憶，將沈從文置於道德審判台前，而這樣的道德審判又顯然是為政治審判服務的：在郭沫若的申討中，「黃色」是為加強「反動」的罪責的。這樣的家庭情感危機與政治的糾纏、被利用，對沈從文是最具殺傷力的：既使他有口難辯，更讓他感到恐懼。

於是，就有了在給丁玲信中沈從文的另一方面的暗示：「欲使我瘋狂到毀滅，方法簡單，鼓勵她離開我」，「中共對我的處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經崩潰恐將無可補救，任何工作意義也沒有了！」[44]現在沒有材料證實中共方面在鼓勵主婦離開沈從文，他的這一暗示或許有幻覺的成分。但有一個事實，連沈從文也很快就覺察到了：在這個歷史、時代的大轉折時期，每個人都必然要捲入政治中，作出自己的選擇。沈從文因此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政治無所不在〉，這可以說是沈從文對新社會的第一個觀察，而他的第一個發現，就是「政治浸入了孩子的生命已更深」。這對沈從文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在1948年決心留在大陸，就是因為「放棄了對於一隻沉船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的希望，將愛給予下一代」，「為孩子在新環境中受教育，自己決心做犧牲」[45]。現在，孩子（當然更重要的還有「主婦」）都並不困難地接受了新政治，新社會，而自己卻因為「鄉下人」的固執卻多所疑慮，這就必然要引起新的家庭衝突。《政治無所不在》一文裏，就寫到「我們共同扮演了一幕《父與子》，孩子們凡事由『信』出發，所理解的國家，自然和我由『思』出發明白的國家大不相同。談下去，兩人都落了淚」[46]。這落淚是動人的，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沈從文終於明白，他如不改變自己，不「向人民投降」[47]，不僅為社會所不容，「即使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時這孤立，神經支持下去已極勉強，時代一變，必然完全摧毀。這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於完全孤立」[48]。家庭是沈從文，也是所有的人，在大時代的飄搖中，最後一塊安身之處，立足之地，現在也發生了被拒斥的危機。沈從文的游離感、孤立感都發展到了極度，已是他極度敏感的心靈所難以承受，而他的豐富的想像力，又極度地強化了他的恐怖感，他終於被迫到了「瘋狂」的絕地，在「投降」之前，只有借「徹底休息」保留一個完整的自我來作最後的掙扎了。

以上的討論，說明 1949 年沈從文自殺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既有政治的壓力，也有家庭的危機，更是易代之際知識分子游離時代，被社會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機。這都是具有極大典型性的；沈從文個人與家庭的情感危機或許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家庭情感危機和政治的糾纏、被利用，在 1949 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一再發生，這也夠得上是一個典型現象。

但問題的另一面卻是置之絕地而後生，在沈從文的瘋狂與自絕中也孕育着新生。正像前文所分析的十年前的那次情感的，家庭的，精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